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欧洲中心论者吗？（2）

[美]奥古斯特·尼姆兹 著 徐跃勤 陈铮玲 译

2009-6-1 13:56:48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打印本页

关闭窗口

革命的新纪元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全球的关注，使他们富有先见之明地在西欧地区之外寻找革命的策源地。因此在1863年年初，他们就断言，“在欧洲又广泛地揭开了革命新纪元”。这个论断的依据是同年波兰发生的农民起义，由此，“熔岩从东方流向西方”。但是甚至在此之前，出现在政治视野中的其他迹象已经使他们有理由感到乐观。1860年年初，马克思就指出：“现在世界上所发生的最大的事件，一方面是由于布朗的死而展开的美国的奴隶运动，另一方面是俄国的奴隶运动。”他所指的是几个月前美国废奴主义者约翰·布朗在弗吉尼亚州的哈泊渡口发动的暴动，暴动虽未成功，但至少反过来又激发了后来的奴隶起义。至于他提到的俄国，作为“来自东方的熔岩”，那里的“奴隶”实际上就是农奴，自从1858年以来，就始终在争取解放。而仅仅一年之后，为了预防自下而上的农奴起义，沙皇便宣布废除了农奴制。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历来重视阶级斗争的世界性，相对于单打独斗式的孤立斗争，他们更看重多个国家的联合斗争。在工人与资本的斗争中，对奴隶制以及其他前资本主义剥削模式的斗争显得至为关键。七年之后，美国内战也已结束，在马克思为《资本论》第一版写的前言中，这种观点表达得更为清晰：“正像18世纪美国独立战争给欧洲中等阶级敲起了警钟一样，19世纪美国南北战争又给欧洲工人阶级敲起了警钟。”从1867年之前的政治形势中可以看出，1860年发生在美、俄的两次“奴隶运动”中，来自大西洋彼岸的运动更具有决定意义。但是风水轮流转，在六十年后的1917年，却是“熔岩从东方流向西方”。

在认识到新的革命时代业已开始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决心只要时机成熟，便积极投身现实政治活动。1864年，英国工联举行的国际会议在伦敦召开，马克思受邀代表德国工人参加会议，并且很快成为新成立的“国际工人协会”（IWMA）即“第一国际”的决策核心。这是有史以来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化的工人阶级组织。虽然它的影响和遗产都十分巨大，但还是在1873年停止了活动。其中主要的原因在于马克思领导下的“国际”公开支持1871年的巴黎公社革命，从而遭到统治阶级的仇视。这场运动中最大的损失是英国工联官员混入协会的最高领导机构——设在伦敦的总委员会。因此，他们的叛离并非一无是处，至少显示出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如何重估英国工人阶级的革命潜力的。

在巴黎公社革命之前一年，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曾对革命前景加以描述：“我坚信，虽然第一次冲击将出自法国，但德国对于社会运动更成熟得多，并将远远超过法国人。”当“第一次冲击”果真在法国以公社的形式出现时，马克思和恩格斯仍然坚信世界革命的轴心早已转移到巴黎以东。这种观点的言外之意是他们认为英国工人运动的重要性已经下降。实际上，由于英国发达的资本主义特性，以及作为真正的工人政党的宪章派协会的存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一度将英国视为工人运动的排头兵。那么，又该如何解释他们前后态度的大相径庭？

早在1858年，恩格斯就再次思考英国革命的潜在可能。当宪章派领袖欧内斯特·琼斯通过降低宪章运动历史形成的纲领要求，从而借助政治手段与自由资产阶级谋求妥协时，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信中写道，这种做法代表了“英国无产阶级实际上日益资产阶级化了”。紧接着他又解释说：“对一个剥削全世界的民族来说，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有道理的。”大英帝国抢夺来的赃物足以使英国工人斗志消沉。马克思在回信中侧重回应的正是这一点，而就是在这封回信中，马克思指出革命运动完全可能“在这个世界上的小小角落里被镇压”，因为以英国为首的全球资本主义仍然处于“上升”阶段。

第一国际建立时发挥重大作用的英国工联领导人，几乎全部来自建筑业工人和熟练手工业工人。尤其后者，主要关心的是面对工业资本主义时的生存问题。这两种人的领导者加入国际工人协会的动机，仅仅是极为狭隘的经济和政治利益，而非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马克思间接提到，在19世纪的四分之三的时间内英国资本主义得到空前的扩张，英国工人阶级因为在此过程中“实际工资对于工人阶级的少数稍微有些提高”而开始分层。工人阶级内部的这些差异在政治上的影响，随着国际工人协会在英国展开的活动，变得愈来愈清楚。较之其他任何问题，更常被提及的是选举权问题和选举政策。这使马克思第一次注意到工联主义者加入总委员会的目的，特别是他们不惜违背总委员会的政策，在竞选场所阻止英国自由主义者支持家庭所有成员都获得选举权，而非成年男子的普选权。

如果说总委员会中的工联主义者曾在选举权议题上背叛过英国工人阶级，马克思相信他们在爱尔兰问题上不会做同样的事情。马克思的策略是以总委员会文件的方式，旗帜鲜明地表明国际工人协会对新近被逮捕入狱的芬尼亚运动成员和爱尔兰民族自治运动成员的支持，与此同时，尝试着在工联主义者与自由党执政的格莱斯顿政府之间制造分裂。如果说马克思关于爱尔兰问题的决定让工联主义者难以下咽的话，那么为了表示对巴黎公社社员的敬意而写作的名著《法兰西内战》，就更是他们无法消化的。无法与协会保持一致的事实，迫使这些仍在总委员会中担任职务的工联主义者彻底断绝了与协会的关系，而且由于其自由党同盟的压力，他们选择了让自己远离那些失败的公社社员，以及马克思对他们毫不妥协的保护。因此，无论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对英国工人运动抱有怎样的希望，这些希望由于那些领导人对于失败后的巴黎公社的反应，现在都已烟消云散。

1872年，国际工人协会在海牙举行了最后一次影响深远的会议，在会上马克思毫无保留地将他对工联主义者的看法公之于众。当有人质问一位代表的资格，指责他无权代表英国工人阶级时，马克思严词驳斥，说：“对于这位代表而言，确实可以说他不是任何一位足以代表英国工人的所谓领导者，这是因为那些领导者都或多或少受贿于资产阶级和政府。”虽然他的这些广为宣传的言论导致与改良派的彻底决裂，但是直到两年后，马克思仍无道歉之意，他在写给友人的书信中说：“我知道，会因此而招致不满、诽谤等等，但是对于这一类的后果，我从来是毫不在意的。现在有的地方人们开始认识到，我只不过通过这种揭露来尽我的责任而已。”

在分析1874年的英国议会选举时，恩格斯运用他和马克思在1858年就已形成的观点，来解释英国工人在政治上倒退的原因，他说：“因为这里的工人阶级从大工业的巨大高涨中得到的利益，比任何地方的工人阶级所得的要多，在英国称霸世界的情况下也不能不是这样。”但是，政治往往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一旦统治阶级自觉地批准了宪章派在历史中形成的要求，政治的主导作用就体现出来。在恩格斯看来，直到1883年，帝国主义对英国工人的斗争意识仍然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他在信中提到：“参与世界市场的统治，过去是而且现在依然是英国工人在政治上消极无为的经济基础。”只有当不列颠统治者对世界的垄断受到其他竞争者的挑战，从而导致劫夺而来的赃物数量减少时，英国工人运动的面貌才会有所改观。因此，与传统的马克思学描述的形象恰恰相反，至迟在1871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已放弃他们早年形成的英国工人能够成为世界工人运动典范的乐观态度。

英国的帝国主义性质及其对国内政治的影响，集中体现在对爱尔兰人民的持续征服上。1869年，马克思在信中写道：“英国工人阶级... 在英国本土永远不会做出任何有决定意义的事情，在对爱尔兰的政策... 还没有和统治阶级的政策一刀两断之前。”这样的论断直到今天仍然能够切中要害，宛若当年。事实上，这个论断还标志着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爱尔兰自治运动看法的重大转变。在此之前，他们将推翻英国的资产阶级统治作为爱尔兰解放的前提条件，言外之意就是爱尔兰的斗争将会取代英国工人斗争的领导地位。但是，1867年芬尼亚运动成员发动的首次起义，迫使他们重新思考这样的判断。

英国政府将爱尔兰降格为一个超大规模的农场以满足英国国内的食物需求，这是马克思修正他的相关政治论述的根本性原因。在马克思看来，尽管这个过程使得英格兰的地主阶级重获新生，但是它对整个社会和政治的影响却是极为消极的，实际上，这也是历史上第一次对这种会被推广到全世界并造成不发达现象的过程的详尽分析。较之于其他因素，这种过程主要考虑的是地主所有制，1869年，马克思在写给恩格斯的信中说：“杠杆一定要安放在爱尔兰。”正如他深思熟虑的结果显示的：“姑且不谈国际上的公道，英国工人阶级解放的先决条件是把现存的强制的合并，即对爱尔兰的奴役，变为平等自由的联盟——如果这是可能的话，或者完全分离——如果这是必要的话。”这个修正后的观点，随后成为当年总委员会掀起为被关押的芬尼亚成员争取特赦的运动的的基本立场。

转载请经授权并请刊出本网站名

Copyright © 2005 www.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 网站声明 | 联系我们

(浏览本网主页，建议将电脑显示屏的分辨率调为1024*768)